

# 论“年轻的正式人”

——一个对当代青年的解释性设定

谢 维 和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青年和青年问题时通常以“边际人”作为本体规定。作者认为，这种“边际人”的设定是以成人社会的稳定性、成熟性为依据的。社会文化稳定、规范及规范体系的有效性、社会教化系统及体制的一致性等是确立“边际人”本体规定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在社会变迁加剧的非常态社会中，支撑着“边际人”本体设定的依据与条件已经或正在解体。同时，变革的社会已经把青年人推向正式人的行列。因而主张以“年轻的正式人”取代“边际人”的本体规定。

作者：谢维和，男，1954年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教授。

所谓“年轻的正式人”，是本文对当代青年的一种尝试性的本体规定。它是依据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以及青年自身的变化，对当代青年所作的一个社会学的解释性设定。其基本含义为：一种尚未成熟的社会正式成员。作为对当代青年的社会哲学的思考，它力求由此反映和揭示他们的本质和社会地位，说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方式，以及不同心态和越轨行为等思想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而为青年对自身的认识和把握、为社会对青年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一种社会学理论的参照。

“年轻的正式人”这一解释性设定，首先是相对于以往对青年的“边际人”的基本设定而言的。后者是目前国内外从事青年研究和青年工作的部门与学者普遍采用的基本前提和模式。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有效力的。

根据一般的解释，“边际人”的基本含义是：由于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规定，青年只是一种既非儿童，又有别于成年人，而介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群体，他们只是处于从儿童走向成年的过渡阶段，是进入社会的准备时期，因此，青年本身的存在具有一种极不稳定的，处于飘流状的“边际”状态。这一规定一直成为国内青年研究界，甚至于国际上青年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设定。例如，世界上著名的青年研究专家F·马赫列尔在其《青年问题与青年学》一书里，便以“本体论问题：青年人的本质”为题，用“目的性取向和社会—时间的二重性”规定青年的本质，其理论内核正是这一设定。在他看来，青年只是在儿童和成熟期两种年龄之间的变化。它意味着：“脱离童年，进入成年——成熟化（人格化）、社会化和自立，必须经过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青年还没有完全超越前一个阶段，也还没有进入后一个阶

段。”<sup>①</sup>他明确指出：“所谓青年，意味着不再是儿童，但还不是成人。”<sup>②</sup>所以，他认为：“同低于成年人的不成熟状态相适应，青年被认为处于不同于成人社会的边缘状态。”<sup>③</sup>目前我国通行的一些青年学教科书和研究专著中，对此也几乎是异口同声。例如，有的著作便认为，“青年是人生年龄分期的一个阶段，即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sup>④</sup>又说：“青年是处在从依附性向独立性的过渡阶段，是一个学习、准备以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的过渡。”<sup>⑤</sup>有的著作更是直接作了如下表述：“青年期历来被认为是从童年走向成年的发展阶段，是进入成人世界的准备时期。由于青年既非儿童，又非成人，处于一种介乎两者的中间状态，因而有‘边际人’（margenal man）之说。”<sup>⑥</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1968年的《关于青年状况的报告》中也认为：“成人世界的倾向是，认为青年应该在社会的大门口等待。”总之，根据这一规定，青年人是不成熟的，他们只是在学习，处于过渡时期，在准备成为一名社会正式成员。

应该承认，这种对青年的“边际人”的本体规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也是对青年社会存在的一种很有意义的解释性设定。

第一，社会文化的稳定性。这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整个社会结构、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处于比较平稳、正常的发展状况中，而没有出现较大的变革与动荡。这样，社会固有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和是非标准等都能够持续有力地发挥作用，从而对社会产生一种较强的整合作用和导向功能，形成一股比较集中的中坚力量，以致于年轻的一代要想进入这一社会，必须经历一个有序的、正常的社会化阶段，然后从“边际人”发展成为成年人。

第二，作为社会文化稳定发展的具体化，社会中各种规范及规范体系的有效性是构成青年“边际人”规定的一个直接条件。这种规范与规范体系的有效性至少包括两个层次：即思想观念与技术知识。首先，就思想观念而言，任何社会的要求、号召都必须通过存在于社会中的各种具体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是非准则和善恶分野等加以贯彻和实施。这些具体规范是一定时期社会理想的具体化，反映了社会所要求的合格人才的基本内容和标准，从而构成了青年人成长、发展的具体社会环境。青年向社会学习，常常是从这些具体规范方面入手的，他们所了解的社会形象和角色，也总是直接地体现在这些方面。可以说，这些具体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为青年提供了步入社会的阶梯和途径。其次，就技术知识而言，社会具体职业和特定角色的意义也必须通过某些技术和知识的规范体现出来。在某些技术和知识一直有效的情况下，青年人要获得某一职业，担任特定角色，就必须进行职业训练和角色培养，丰富自己的知识与阅历。显然，正是这些具体、有效的社会规范使尚不熟悉它们，又必须学习和掌握它们的青年成为“边际人”。

第三，正常、有序的文化传播不仅要求规范的具体有效性，而且要求它的生动性和人格化。这也即是说，它要求有一大批能够真正信奉这些社会规范，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教育者和一个贯彻它们的成人社会，包括家长、教师、社会工作者、青年教育工作者及各级领导干部等。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在家庭、社会、学校及各种公共场合，把这些规范传递给青年。这样，使青年真正感受到这些社会规范的力量，认识到它们的现实性、可行性和社会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教育者和成人社会作为社会的正式

①②③ 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与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第145页。

④⑤ 《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7、66页。

⑥ 《现代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代表和社会主导精神的体现，才能够获得青年的信任和尊敬，才能够以他们的成熟性说明和反映青年人的不成熟性。

第四，整个社会教化体制的一致性也是构成青年“边际人”规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无论是社会文化的稳定，还是社会规范的实施，都要求社会各个阶层、集团在教化取向上达到基本一致，也要求社会中不同教化部门能够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只有在相对一致的教化体制下，才能使青年的社会化在不断强化的环境中循序渐进，逐步完成。也才能使青年感受到相对统一的社会要求和力量，从而不致于迷失自己在社会中的“边际”地位，而不知向何处过渡和发展为好。

循此，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对青年的“边际人”规定，具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其一，这一“边际性”是相对于一个“中心”而言的。青年之所以具有这种“边际性”，只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某种主导的中心。只是由于存在某些成熟的社会存在、要求，才反映出青年的不成熟。只是由于社会本身的稳定、社会规范的有效和人格化，以及教化机制的统一性，才使得力求进入社会，尚有待于或正处于教化中的青年显示出其“边缘性”。因此，它是一种对比性概念。其二，“边际性”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或一种可能性。它显现出一种正在成为什么，但又尚未完成的状态，它可能成为或获得某一状态和地位，但也有可能不“成为”或不“获得”这一状态，而向其它方向发展。当然，处于成长中的青年无疑是具有这一特征的。

如果说前一个特征着重从比较上说明青年的“边际”地位，那么，后一个特征则主要是从青年自身的角度分析它，从青年本身的不成熟性和不确定性反映这一“边际性”。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传播媒介的有限性及交通的不甚便利，使处于成长中的青年在知识面和 life 范围等方面局限于较小的领域中，以致于使这种“边际性”更为突出。

不难发现，正是这样一种对青年的“边际人”的规定，本身便包容了一种变化的可能。因为一旦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发生了变化，它必然会出现变化。而这种社会变化也就是本文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

## 二

社会改革开放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导致了以往青年人“边际性”的丧失，为新的“年轻的正式人”的规定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首先，就社会整体而言，十几年来，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这些变化：第一，我们党在充分认识国情，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发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和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相比，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二，过去那种不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正在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所代替，包括各种集体经济、独资与合资经济以及大量的个体经济，由此形成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层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得到蓬勃的发展。第三，与单一所有制相适应的单一分配制度，正在被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代替。第四，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逐渐被市场经济所代替。这一系列变化给人们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其次，随着社会的变化，反映社会要求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过去的与原有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以及脱离社会实际由人为因素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必然会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出现种种变化，包括在内容上的调整与补充，形式上的改型和修正，有的甚至被更新，也不乏有符合时代精神的新规范的逐步形成。这些，已经是当今社会生活中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人们过去常常把道德看成是调整人们行为的根基总和，视之作为一种约束性力量。为此，人们在谈论道德理论时也不时地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道德总是要以或多或少的个人牺牲为前提。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牺牲才能达到人格的高尚。如今，人们却提出要把道德规范当作把握自己的一种内在方式，看作是个人成长、丰富和完善的手段。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也并非单纯对集体利益的服从，而是要强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强调在集体主义原则下的有机结合。过去，社会曾大力提倡“小草”精神，如今却积极鼓励广大青年走成才之路，并为此提供和创造种种条件；过去突出“普通一兵”、“螺丝钉”和“砖瓦”的风格，如今社会各个部门却提供各种机会，为青年人的出类拔萃创造条件，以致于接纳容许“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算好士兵”这样一些在以往必然遭到非议甚至批判的论调的宣扬；过去，精神价值、社会利益、奉献给予等讲得较多，如今，人们也要求这些与物质利益、个人价值和索取相结合。更有甚者，就连过去一直为人们称颂的，作为传统美德的社会规范也似乎受到了冷遇和排挤。以“谦虚”为例，如今充斥于广播电视、报刊杂志、街头巷尾的各种广告中，几乎已丝毫没有谦虚的味道。在寻求工作和跳槽的自荐书上，也很少有谦虚的词藻。对于这些变化，目前尚不能完全以一种结论的方式加以肯定，对它们做出匆忙的价值判断也为时过早。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变化对青年的成长带来了两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一，它意味着青年的成长环境本身发生了变化，稳定的体系变成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东西；其二，青年人不能象过去那样毫不怀疑地接受所有既存规范，以致于出现了所谓的“迷惘”和“失落”的状态。总之，具体社会规范的变化使人们对社会的要求产生了一种模糊认识，而“说不清楚”也已经成为人们一句比较时髦的口头禅。甚至在很多人所喜爱的电视剧《渴望》中，也唱出了“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的歌词。

第三，作为体现社会要求和行为规范、并对青年进行言传身教的各类教育者和成人社会，在改革开放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基本体制及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改革，对于在过去成长起来的教育者和成人而言，也是未曾经历的新事物，因而也必然产生新的难题和困惑；另一方面，社会规范的变化也使他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失去了往日有效的凭藉和依靠，从而在新的矛盾面前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无须太留心，我们便可以在生活周围的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嘴里听到各种各样的“看不惯”的牢骚，以及看到表示不理解和想不通的种种现象。这些十分清楚地表明曾经获得确定性的教育者以及成人社会如今又重新处于不确定之中，或者说，已经初步完成社会化的人又重新开始了新的继续社会化。这一变化无疑使青年在社会化和成长过程中失去表率，并进一步增加在心态上对社会规范的“迷惘”。

最后，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分化，以及由此增大的社会差异，还因为社会改革开放本身的不平衡和不同步，社会的各类教化机构出现了不甚一致的状况。这种不一致性也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要求和价值选择，以致于形成不同的标准和期望；其二是社会中不同教化机构也往往在取向上出现差异。

课堂上、书本上讲的，往往与现实不一样，学校里教的、家庭中感受的、社会中所体验的等等，也往往是有差异的。这种状况不仅不能使青年的教化不断地得到强化，而且会导致他们在种种不同的选择和要求中出现徘徊和困惑。

上述变化集中反映了一个十分尖锐的事实：过去用以规定青年的“边际人”地位的中心参照系已显得日趋模糊。如果说，过去这种中心性主要来源于成人社会的稳定性和成熟性，那么，改革开放中这种稳定性和成熟性的丧失也就直接意味着成人社会中心地位的丧失。进而，在失去这一参照系之后，我们又凭借什么去规定青年的“边际性”呢？从另一个方面说，由于成人在社会改革开放的变化中也面临着一种重新和继续社会化的需要，因而也实际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他们和青年一样，也有一个理解、认同和适应的要求。由此，我们如果要继续把当代青年规定为“边际人”，便显得有点理由不充分了。

### 三

参照系的变化使青年与成人社会的距离更为接近，而现时代青年本身生活状况及素质的提高也使他们不断地超越“边际”的界限。不难发现，现代科学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使当代青年的成长环境在两个方面与其前人有很大不同。第一，就生理上而言，大量高蛋白食品的生产和食用，使现在的青年在肌体上比过去的青年成熟得早，使其在骨骼和大脑的发育上提前。第二，就心理上而言，日益发达、先进和普及的传播媒介，包括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使青年接受信息的途径更为广泛，了解信息的速度更为迅速。他们不一定非要通过父母、老师和课堂去获得各种知识不可，有时，他们甚至凭借自己的优势，在某些问题上掌握了比成年人更多的知识。由此，在相对早熟的生理基础上，心理成熟的步子也迈得更快了。当今社会中广大青年已经成为工厂、农村、甚至是科研队伍的主力军。就世界范围说，这也可能是某些国家的议会提前让青年获得正式公民权的理由和依据。现在，自主、自立和参与，已经成为广大青年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他们对生活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对事物的判断也正在形成风格。他们已经不满意社会、家庭为他们作出的种种安排，更不愿按死板的一定之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已不愿意，也不承认自己仅仅是社会的旁观者，或预备队，而是勇敢地承担起沉重的社会责任，去思考，去建设，去创新。

显然，如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一方面，过去体现和代表社会要求和规范的成人社会的地位和确定性在降低，他们的成熟性在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过去作为乳臭未干的“边际人”的青年，其地位和成熟性却呈上升趋势。这样一种“一降一升”的变化，恰恰是当今形成“代沟”和“代际冲突”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现在，不少青年人不爱听成年人或自己父母的话，自行其是，甚至把他们看成僵化、保守与落后。尽管自己的某些行为举止不为成人社会所接受，也毫不在意。正如在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我们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坏小孩……我们生长在不同的时代。”而成人社会也对青年的某些行为嗤之以鼻，视为大逆不道，“不象个样子”。尤其在一些社会问题上，青年人和成年人、老年人常常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出于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依照不同的思路和参照系，彼此间常常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差异……把眼光和思维仅仅停留在这种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代沟”和代际冲突上是远远不够的，力求去抹平这一客观存在的差异、消解这一冲突也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以及由此出现的代际冲突，正是说明当代青

年已经与成年人、老年人，以及他们的父辈一起，共同面临和正视着社会的改革、国家的命运，并共同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已经不能用过去那种“边缘人”的解释性设定去认识当今的青年，更不能将他们看成是不懂事的孩子，是社会生活的局外人，是可以随便呵斥教训，尚没有获得权利义务的“后生”。而是应该赋予其一定的社会责任，用一种法权的观念去认识和要求他们，衡量他们的言行，并真正地由此尊重他们的存在和意见。正是在这种面临同样的问题，担负同样的责任，具有同样的使命的意义上，青年已经站在成人社会的行列之中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为一名社会的“正式人”。

#### 四

尽管当代青年已经跨入了“正式人”的行列，但他们毕竟还只是一种“年轻的正式人”。“年轻的”这一定语，恰恰说明了青年由于涉世未深、阅历尚浅，以及青春期本身给他们造成的种种局限和不成熟性。这一点也是任何时代青年的固有特征。就当代青年而言，这种“年轻”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青年所具有的“正式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更主要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是社会的变化和改革把他们推上了社会的“前台”，就其本身说，仍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幼稚性。换言之，是由于在改革过程中成人社会乃至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相对的不稳定状态，具有一种开放性和边际性，而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是学习，同时也是建设，才使得当代的青年带着一种内在的不成熟性承担起成人的社会责任。因而，绝不可因此而忽视青年自身的“年轻”。

第二，尽管青年有时能够占有较多信息，但他们并未形成自己完备的认知结构。借助于发达的传播媒介，青年多半只是像海绵那样拼命地吸收知识。这样，他们的眼界可以比过去更开阔，思维更敏捷，反应速度更为迅速灵活，但无论如何，他们尚没有形成自身的认知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对知识的接受多半是机械的、零碎的，只是运用其中的个别部分孤立地认识和分析各种社会问题，而不能自觉地将各种知识构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结构，进而有机地选择、接受和评价各种信息，并综合地对各种社会和人生问题作出反应。选择，难免在认识和实践由于主观性、片面性而陷入困境。这里，最能表现这种“年轻”和“不成熟性”的现象便是在思想倾向上的摇摆性。于是，在思想和言行上也表现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虽然形式上也是自己在选择在决定，实际上是为他人所左右。显然，只有在形成自身比较稳定的认知结构之后，才可能实现对各种理论的兼容并蓄和扬弃得当，并始终保持自己在理论和认识上的自主性。这是大多数青年所未能达到的。就此而言，他们与成人社会是有差距的。

第三，在基础知识、技术和基本的社会角色要求的掌握上，青年人也是不成熟的。虽然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工艺的日新月异，并引起了社会一系列新观念的产生，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基础知识和基本要求，甚至对人们对这些基础理论与基本要求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社会如何变革动荡，只要这一社会仍然在运作在发展，它就有某些恒定的规则在起作用。而这是任何要进入社会的人必须首先掌握的。令人遗憾的是，当今有些青年尽管满脑子新思想，但却未能掌握这样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和社会角色的基本要求，以致于常常在一些常识性问题上闹笑话，并在一些基本社会要求上遭到社会的否定。在这方面，青年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成人社会学习。

第四，浓厚的感性取向。它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个体性，即倾向于以自己为本位去幅射社会生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由于社会规范的变化和社会差异增大后社会整合程度的降低，处于社会化中的青年在教化力量相对减弱和多样化而难以适应的情况下，更为突出的内化活动便强化了个体在生活选择中的份量，并倾向于单纯从自己的角度对社会审时度势。其次是情感性，即以强烈的情绪指导自己的选择，以某种好恶左右自己的判断。虽然当代青年对以往的各种观念和规范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和挑战，并在行动上有所拒斥，但却未能以一种新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也未能提出和建立一种新的、切实可行的观念。他们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而失落之后便不得不诉诸于自己的感情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风格化的反抗”成为当前许多青年的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跟着感觉走”也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这与具有较强理性色彩的成人社会相比，无疑是不成熟的。

最后，青年中对现实和未来的一种浪漫主义的认识态度也反映了其本身的不成熟。这一点在青年文化的脱节现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我们拟把某种就本身而言是极其完美和动人的理想模式规定为“最优”，而把那种最能符合实际的理想模式规定为“最佳”。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纷至沓来的各种文化思潮和改革模式中，不少青年人总是对那些“最优”选择趋之若鹜，奉为自身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思路常常是认为越完美的越好，而忘记和忽略了这种“最优”模式的现实性，看不到往往只有“最佳”模式才最有效和可行。更有甚者，一旦奉为至尊的“最优”选择碰到某种必然的障碍，便反过来把罪过一古脑推给现实，并加剧了对现实的不满，由此形成一种错误的批判态度。实际上，正如治病仍需依靠这一带病的身体一样，对于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也只能立足于这一带有弊端的社会本身去改革。

诚然，当代青年的不成熟性和“年轻”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它们在不同个体与时空中也有不同形式。本文并不想详述这些，只是力求说明，当代青年只是一种“年轻的正式人”，他们仍需要教育、引导和帮助。

## 五

“年轻的正式人”这一规定，与过去的“边际人”规定无论在内部矛盾或结构上都有较大的不同。作为现实中青年社会地位的反映，它可以更好地说明当前青年的各种存在方式，并为青年研究和青年工作提供有效的参照和理论框架。

以往对青年的“边际人”规定，就基本思路而言，是以一种进化的观点为基础的。它是从由儿童向成人发展的过程来规定青年的本质。它强调的是青年在不断摆脱孩童的稚气、不断走向成熟过程中的特点、阶段和规律性。它更注重的是青年的未来，而不是他们的现在，因此，就这一规定的内在矛盾而言，它主要表现为青年和社会的矛盾，即青年的追求与社会要求的矛盾，不成熟与成熟、不稳定与稳定、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或者说，社会化的基本手段也主要是学与教。相对来说，这是比较简单的，而处于这种矛盾中或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也能够比较顺利地成长。然而，“年轻的正式人”这一规定则有所不同。就基本思路讲，它根据现实情况，同时运用进化和功能两种方法为基础。它不仅注重青年人本身的成长、成熟和社会化，而且也注重青年人在社会中的现实作用，注重青年与其他社会阶层、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冲突，以及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的功能；它不仅强调青年的未来，而且也强调他们的现在。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

已经可以看到,本文正是从青年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责任和使命,从青年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出发,把他们规定为“正式人”。同时,也是从青年的发展、成长,从他们的进化,将他们视之为“年轻的”。因此,这一规定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就变得更为复杂。它不象“边际人”规定那样只是单纯的一重矛盾,而表现为双重矛盾,即一方面是从进化角度而形成的不成熟和成熟的矛盾,就此而言,等同于“边际人”规定中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其本身既担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却又具有一定的幼稚性和不成熟性的矛盾。这两重矛盾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形成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也恰恰因为这样,当前这一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常常使社会和青年本身都感到困惑。其中,尽管有许多具体的原因,但这一矛盾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并未清楚地认识,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复杂矛盾的客观存在,不能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坦率地说,虽然确凿无疑的变化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我们对青年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原有的规定性上,我们的青年研究和青年工作仍然拘泥于“边际人”的设定,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与其相应的研究、工作和教育模式。这样,难免会带来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影响实际工作的效果。有时甚至会由此造成青年的抵触和逆反行为,拉大他们与社会的距离。而且,这一设定很难充分解释当今青年的各种行为方式和存在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由于认识上的不同而加深代际差异和冲突。然而,“年轻的正式人”这一设定,则不仅能够较好地说明当今青年中各种现象,而且还可以为新时期青年研究与青年工作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首先,这一新的规定为更好地认识和说明当代青年的各种行为方式、特点和要求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解释性设定。为什么现在的青年常常表现出某种桀骜不驯的性格,不愿轻易地由他人摆布,甚至视父母师长的劝诫于不顾,要求自立、自主,要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活法”?可同时,他们在自己的行为选择中又经常表现出徬徨、犹豫和痛苦,表现出一种易受暗示和从众的倾向,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认识和思考问题。这种状况不能不与其矛盾的本体特征有关。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青少年的各种越轨行为普遍增多,青少年犯罪的比率也逐年提高,并且表现出一种盲目性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那种自以为懂事,能够自我决定,而又由于本身的不成熟而经常失误和越界造成的。另一个十分严肃和令人焦虑的现象是:为什么近年来各种典型人物对青年的教育总是难以持久和奏效呢?据了解,不少青年并非不愿向各种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也不完全是出于怕苦、怕累和不愿自我牺牲,而更多地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典型和模范人物并不完全适合他们,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并非如此,因而在思想和言行上表现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抵触。但是,由于他们往往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些典型和模范的事迹,从中学习和汲取某些有价值的部分,从而在行为中又表现出种种“失范”的现象。总之,在当代青年身上反映和体现出来的各种矛盾现象,那种要求自立和参与,又自立得摇摇晃晃,参与得歪歪斜斜,恰恰可以通过“年轻的正式人”这一设定得到社会学上的解释。相比之下,过去那种单纯的“边际人”规定便无法说明现代青年的这些特有现象。

其次,这一设定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青年教育和社会工作的改革提供了新的社会学的理论依据。不难看出,当我们把青年人规定为“边际人”时,相应地建立起来的青年教育工作模式和青年社会化模式必然具有一种“教导”的特点。它是一种单纯的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相互作用,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教导者”。从社会化中教化和内化两个因素的比较看,也是教化占主导作用。从青年工作的角度看,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把青年当作毫无

权利与责任、不懂事的孩子。显然，这正是我们以往青年工作和社会化的特征。然而，当我们把现代青年规定为“年轻的正式人”时，其相应的教育工作和社会化模式必然会出现与过去不同的变化。相对而言，将会产生一种有别于单向的“教导”而更多地注入了人情味的、朋友式的“辅导”的特点。由于现代社会中各种条件、环境和参照系的变化，青年人本身也被推入了正式人的行列，新的模式便不再是单纯的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在成熟与不成熟之中又包含了某种同样不成熟之间的关系。其中，一种是在成熟之后对新变化不适应的不成熟，另一种是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不成熟。根据这种新的关系，在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青年本身的内化功能将进一步突出，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教化的任务也将由于关系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形式与内容。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新的设定已经把青年列入了社会正式存在，因而在青年工作中，就必须赋予青年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意味着两种含义：其一，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真正地尊重青年；其二，更严格地以一种社会正式成员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他们的言行，并给予必要的约束。这才是真正的尊重。绝不可再以其为孩子而马马虎虎地教训一番了事。所以，培养必要和严肃的责任意识也应成为当今社会教化的主要内容。

## 六

诚然，“年轻的正式人”只是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性设定提出的。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它也具有两个必要的限定：第一，它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去认识和解释当代青年的各种社会现象，并不能包罗万象地说明青年的一切。绝不可完全取代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理论。第二，它作为一种解释性的设定，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因此，即使在社会学的范围中，它也不可能是光照一切的“通灵宝玉”。它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通过各种顺应和同化而不断充实和完善。

也许有人会从时效上对这一理论设定提出质疑，理由是：这种解释性设定不过是在特殊的社会变革时期有效，一旦社会完成变革而恢复稳定，由暂时的非常态发展时期转入社会常态发展时期，使相对不正常的文化传递重新得以有序化，那么，这一设定便不再适用了。的确，没有一定时效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设定所体现的青年与成人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暂时的，还是比较长久的？笔者认为，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暂时的，它必定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青年社会地位和存在方式的基本点。因为，现代社会不同于过去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社会变化的频率加快，包括知识的淘汰、观念的替代、理论与技术之间的转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更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任何具体的理论、规范和观念要想“各领风骚数百年”，已成为不可能。所以，在这种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任何文化的传递都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模仿和领受，而意味着一种重构性工作。它意味着任何一代在继承先人的文化传统时，都面临着一种创造的任务和要求。新一代必须在学习中批判与建设，否则只能为时代的进步所淘汰。而这就决定了在这种社会条件中的青年具有“年轻的正式人”的身份。它表明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和重构性任务，又体现了其必须向社会学习，以弥补自身在阅历、经验上的不足，尽快形成自己的认知结构。由此可见，“年轻的正式人”这一对当代青年的解释性设定是具有时效的，而且必将成为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中的理论设定。

责任编辑：王 颖